

中共党史人物在渝活动与重庆社会发展述论

张新华

本文所指的重庆是以直辖后的新重庆地域为据;所论及的中共党史人物包括:重庆籍的党史人物,如赵世炎、杨闇公、刘伯承、聂荣臻、杨尚昆等;在巴渝大地上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如杨闇公、车耀先、罗世文、江竹筠等;曾经长期在重庆工作的革命家,如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王若飞、邓小平、刘伯承、贺龙等;先后多次亲临重庆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如毛泽东、江泽民、李鹏、朱镕基、胡锦涛等。

上述四个方面的中共党史人物群体,在重庆近百年的发展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这是重庆地方党史和经济社会发展研究的重要内容。

鸦片战争以来,重庆虽然地处内陆,但得长江黄金水道的便利,在内地率先开埠,近代工业文明得以滋生;同时,良好的地理环境和比较深厚的文化传统,使得重庆在西南开风气之先。五四运动以后,国内具有先进思想的知识分子和马克思主义先驱者也相继来渝活动,以至逐渐形成一股宣传先进思想的热潮。其间,吴玉章、邓中夏、恽代英、肖楚女、陈愚生等在重庆的讲学和革命活动,为进步文化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初步传播作出了重大贡献,成为了重庆地区马克思主义运动的开拓者。

正是由于这些新思潮,催生了巴渝大地一批进步的优秀儿女走出夔门,接受中国乃至世界的先进思想,成长为中国共产党内重庆籍的著名革命家。吴玉章在回忆赵世炎的革命生涯中说道:1915年毕业于重庆酉阳龙潭高级小学堂的赵世炎考入北京高等师范附属中学,1917年“世炎同志因受当时民族危机的刺激和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急于寻求国家和民主的出路,便来这个学校(指吴玉章在北京办的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一引者注)学习法文,准备出国留学”,最终成长为党的早期活动家,并于大革命时期介绍吴玉章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用吴玉章的话说,“我的这位优秀的学生,这时变成为我的引路人。”

重庆地区以社会主义为突出内容的新思潮与四川党组织首先在渝建立有着必然的因果关系。1924年5月21日,根据重庆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安排,杨闇公在重庆巴师校“讲演主义的真谛”,台下的青年学生“是非常的注意的,表现一种很诚恳的样子。”而此一时期以杨闇公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整体的理解与把握,较之五四时期有了很大的进步。1924年9月15日,杨闇公明确表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的基尔特社会主义,“真是太不明白中国今日的地位了”,“因吾国处的地位,已全陷于半殖民地状态中”。强调“民众的先锋队”“要以民众为后援,尤其是无产阶级”。这种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深刻的理性认识及其广泛的群众基础,是中共党史人物在重庆活动的必然结果。

这一结果,不仅传播了马克思主义,同时培养了一大批革命骨干分子,推动了以“万县惨案”、“3·31惨案”等重大历史事件为主要内容的重庆地区的国民革命运动。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一方面四川军阀混战,重庆地区动荡不止。另一方面,党领导的革命武装也在重庆边远山区开展了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活动,如在城口,就留下了李先念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战斗足迹。抗战全面爆发后,随着国民政府西迁,重庆以战时陪都的地位展现于中国和世界,迎来了近代重庆发展史上的鼎盛时期。而中共党史人物在渝活动则是其中辉煌的一页。1939年1月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成立,周恩来任书记。它是党中央在国统区中心的秘密代表机构,负责领导整个南中国党的工作。重庆时期的南方局,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王若飞等中共领导人以坚定的原则和灵活的策略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以崇高的理想和高尚的人格赢得了国统区各阶层人士和广大群众的敬仰,并孕育和产生了彪炳史册的“红岩精神”。

抗战一结束，毛泽东以“弥天大勇”的气概亲赴重庆谈判。历史希望国共双方、毛泽东与蒋介石“作世界所关心的一次胜利与和平的握手。”重庆又一次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留下了耀眼的定格。重庆谈判的一个重要延伸，是毛泽东的《沁园春·雪》在的公开披露。“咏雪”一词为南方局成立以来周恩来等在重庆树立的共产党人形象写上了神来之笔，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欲与天公试比高”的英雄气概，揭示了“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历史发展规律。

解放战争时期，重庆的共产党人彰显了惊天地、泣鬼神的精神风貌。一方面，川东游击队在异常艰难的条件下开展武装斗争。另一方面，在白公馆、渣滓洞国民党反动派的集中营里，以车耀先、罗世文、江竹筠等为代表的一大批革命志士，坚贞不屈，视死如归。在“11·27”烈士群体的身上，展现了共产党人“失败膏沃土，成功济苍生”的牺牲精神和博大情怀。尤其是先烈们牺牲前的“狱中意见”，记载着共产党员用血的教训向党提炼的最后铮言：“一，防止领导成员腐化；二，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的锻炼；三，不要理想主义，对上级也不要迷信；四，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跳到‘左’；五，切勿轻视敌人；六，重视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七，严格进行整党整风；八，惩办叛徒特务。”这用生命、忠诚和理性写就的八条意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仍有着极强的现实针对性，警醒着后来的共产党人。

可以说，中共南方局、重庆谈判、“11·27”惨案从不同侧面极大地提升了重庆的历史地位，充分展示了共产党人的光辉形象，是重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

邓小平与重庆有不解之缘。五四时期，邓小平经重庆到上海赴法国，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解放战争期间，邓小平与刘伯承挥师西进，一举解放了被国民党反动派盘踞的重庆这个重要据点；建国初期，邓小平在重庆主政西南，圆满完成了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并成功地恢复和发展了西南地区的国民经济。

进驻重庆之初，邓小平在给中央的汇报中说道：“我主要注意力放在财经上。”邓小平在重庆市的接管工作会议上敏锐地作出指示：“我们从人城那天起，就应该把领导精力转向城市，着手整理和迅速恢复敌人破坏的人民经济生活，稳定金融市场。”正是在西南局和邓小平的直接领导下，新重庆迅速完成了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卓有成效地恢复和发展了国民经济。

如果说邓小平坐镇重庆，主政西南，开创了建国以来重庆发展的新篇章，那么1958年毛泽东再度亲临重庆，就是鼓舞重庆人民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年，周恩来在李富春、李先念的陪同下两次来渝视察；邓小平总书记也于1958年、1959年两度到重庆视察工作；此外，董必武、贺龙、徐向前、聂荣臻、罗荣桓等领导人也先后在重庆参观、视察。党和国家领导人如此频繁地来重庆指导工作，也许正是为重庆其后的发展谋划宏大的规划。早在1956年毛泽东就开始秉承孙中山的遗愿，酝酿兴建造福于子孙的三峡工程。“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的浪漫设想，如今已经变为现实。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在关注全国形势的同时，非常关注四川能否尽快致富奔小康的问题。他曾多次提出，要研究一下四川太大、人口太多、不便发展、不便管理的问题，要研究发挥重庆中心城市带动作用的问题。这应该说是重庆直辖的先导。

1980年7月，邓小平在四川省领导的陪同下，到重庆后乘船东下；1983年，邓小平欣然题写“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馆名；1986年1月，邓小平、王震到达成都，和四川人民一起欢度春节。邓小平和王震去蓉途中，曾参观了大足石刻艺术；晚年邓小平先后为漆南薰、杨闇公、《新华日报》和重庆机场题词。这一系列的题词，寄托着邓小平对重庆特殊的情感和殷切的希望。

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加快重庆的发展寄予厚望。江泽民、李鹏、乔石、李瑞环、朱镕基、胡锦涛等中央领导人多次来重庆考察指导工作。

1991年4月15日至16日，江泽民视察重庆期间题词“发扬红岩精神，沿着老一辈革命家开创的革命道路奋勇前进”。红岩精神成为新时期重庆人民开拓奋进的巨大精神力量。

1992年7月1日，重庆隆重庆祝成渝铁路通车40周年。江泽民、李鹏为此欣然题词。50年代成渝铁路的建成和60年代三线建设的实施，构成了党和政府建设西部的先导；是年11月，李鹏抵渝，就三峡工程和重庆经济等问题作了指示；1994年5月2日，聂荣臻元帅陈列馆奠基仪式在江津区隆重举行，江泽民、李鹏分别题词纪念。1994年10月，江泽民再度视察重庆。他的题词“努力把重庆建设成为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为重庆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同年12月，李鹏视察重庆。“开发三峡，振兴重庆”，李鹏的题词揭示了三峡工程对重庆发展的重大机遇。

1996年5月、6月、9月，李瑞环、乔石、胡锦涛先后到重庆考察。中央领导同志纷纷来渝，对重庆发展寄予厚望。10月，李鹏又一次亲临库区，考察三峡移民工作，希望通过开发性移民，为广大的人民群众创造一条脱贫致富的路子来。

1997年3月14日，八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决定，批准设立重庆直辖市。重庆肩负着发挥长江上游经济中心作用、探索大城市带动大农村的路子、搞好开发性移民等历史重任。

1998年3月，江泽民参加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重庆代表团全体会议。他指出，重庆要集中精力抓好开发性移民、国有企业改革、加快农村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建设四件大事，为全面开创新重庆工作的新局面指明了方向。

同年4月，江泽民第三次踏上重庆这块热土，对直辖一年来各项工作的良好开端予以充分肯定；10月，李鹏到三峡库区考察。自从三峡工程于1992年经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以来，这是他第七次考察三峡库区。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了“开发性移民”的决策，使三峡移民走出了一条“迁得出，稳得住，逐步能致富”的新路；2001年，国庆中秋双节同庆的时候，李鹏专程前往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亲切看望老区的各族干部群众，希望老区人民把山清水秀的家园建设好，过上幸福的生活。

1998年12月，朱镕基考察了重庆市和湖北省的移民工作情况。2001年新年伊始，2002年春节之际，他又先后两度到重庆考察工作。朱镕基强调，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为重庆实现新的振兴提供了良好机遇，要十分珍惜和利用这一历史机遇。坚持从实际出发，遵循客观规律，注重实效，充分发挥区位优势 and 特大城市的经济辐射、带动作用。

2002年5月，在重庆直辖五周年的时候，江泽民第四次到重庆视察。江泽民对红岩精神作了高度的概括。他指出，风雨如磐的革命斗争岁月，培育和形成了伟大的红岩精神。红岩精神充分体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的崇高思想境界、坚定的理想信念、巨大的人格力量和浩然革命正气。红岩精神同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一样，都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江泽民揭示了红岩精神的科学内涵、历史地位和巨大作用，这对更好地弘扬红岩精神、建设新重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非常关注新重庆的发展。1996年6月26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的胡锦涛参与了设立直辖市的决策，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鹏一起，在北京召集当时的四川省委书记谢世杰、省长宋宝瑞、省委副书记蒲海清、重庆市委书记张德邻开会，正式通报中央设立重庆直辖市的决策，研究设立重庆直辖市的筹备工作。

2002年10月3日至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胡锦涛到重庆市考察工作，实地了解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及开展扶贫助困、库区移民安置、再就业等情况。胡锦涛充分肯定了重庆建立直辖市五年来各项事业取得的新成绩，要求“重庆作为长江上游的工商业重镇和连接我国中西部的一个重要战略枢纽，在实施西部大开发的战略中应该走在前列”。2006年，重庆已基本实现移民“搬得出”的目标，而移民“稳得住，逐步能致富”的压力仍很大，正在苦寻破解库区产业空虚和移民就业问题的路径。胡锦涛总书记作出重要批示，要求中央有关部门采取措施，化解矛盾，确保三峡移民工程顺利完成。这一重要批示，促成了中共重庆市委二届九次全委会的胜利召开，让一系列惠民政策飞向库区。

2007年3月8日，全国“两会”期间，胡锦涛总书记在看望重庆代表团时的讲话又一次给重庆人民巨大的鼓舞：“直辖10年的实践证明，中央设立重庆直辖市的决定完全正确，今天的重庆站在了新的发展起点上！”在讲话中，胡锦涛总书记给重庆的新发展“导航定向”：努力把重庆加快建设成为西部地区的重要增长极、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中心、城乡统筹发展的直辖市，在西部率先实现全面小康社会。要求重庆加大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力度，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加快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革步伐；着力解决好民生问题，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加强城市建设，提高城市管理水平。由此，形成了重庆新阶段发展的“314”总体部署。

历史表明，党成立80多年来，重庆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和西南的工商业重镇，重庆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有着十分突出的地位和作用。从率先开埠到战时陪都，从西南大区首府到几度确立直辖，重庆以其独有的区位优势 and 强大的辐射功能，不辱使命，卓尔不群。2007年6月7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下发了《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批准重庆市和成都市设立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通知》。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建设，有助于重庆全面推进各个领域的体制改革，并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率先突破，大胆创新，尽快形成统筹城乡发展的体制机制，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从而为推动全国深化改革，实现科学发展与和谐发展，发挥示范和带动作用。

历史说明，重庆籍党史人物承载着巴渝文化的熏陶，为党的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巴渝大地上牺牲的革命先烈，其舍生取义的壮举与“巴师勇锐”的传统有着明显的一致性；曾经长期在渝工作的革命家在重庆这个特殊舞台上，演出了重庆乃至中国历史上的一出出重头戏；每当重庆或者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时刻，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亲临重庆作出重大决策。可以说，重庆的深刻变迁是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缩影，凝聚了党的领导群体的亲切关怀和殷切希望，也是中共党史人物与重庆人民共同奋斗的结果。